

社会交往内卷化、数字经济与进城农民工创业

张笑寒, 李金萍

(南京审计大学 经济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15)

[摘要]鼓励进城农民工自主创业是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和测算的数字经济指数,实证检验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创业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社会交往内卷化显著抑制了进城农民工创业,且对机会型创业的抑制效应更大;数字经济负向影响进城农民工的生存型创业,而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为正向;数字经济有助于缓解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机会型创业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社会交往内卷化;进城农民工;数字经济;生存型创业;机会型创业;农民工创业;农业经济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3114(2022)04-0092-10

一、引言

当前中国正处于“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全面胜利,劳动力成本上升、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新冠疫情暴发,使得就业成为城乡社会面临的一大突出问题。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逾2.85亿人,大多数就业于制造业、建筑业等门槛较低、待遇较差的岗位,平均月收入仅4072元,且就业形势受疫情影响严重。作为城乡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主体,农民工群体的“草根创业”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缓解就业压力、促进农户增收、缩小城乡差距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人社部等印发了《关于做好当前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人社部发〔2020〕61号),要求各级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鼓励农民工从事个体经营,并对符合条件的农民工按规定给予政策优惠,以实现农民工由普通打工者向创业者转变。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指出要“建立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机制,全面清理各类限制性政策,增强劳动力市场包容性”。因此,许多地方十分重视对进城农民工群体创业的扶持,搭建创业平台,开发创业项目,构建服务体系,并采取创业资金支持政策、信贷优惠政策、税费减免政策、创业培训政策等,为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推动进城农民工创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实践中,进城农民工创业仍然面临资金不足、知识储备和创业素养不足、创业资源匮乏、市场环境复杂等各种障碍^[1],如何破除进城农民工创业障碍并提高其创业能力,俨然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的共同难题。

二、文献综述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以往研究较多地侧重于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2-4],而对于农民工群体乡城流动却关注不多。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进城农民工作为连接城乡的要素桥梁理应得到必要的关注,相关研究才逐渐增多。张双志等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

[收稿日期]2022-03-22

[基金项目]江苏省科技厅创新支撑计划软科学研究项目(BR2022060);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KYCX21_1815)

[作者简介]张笑寒(1968—),女,江苏南通人,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与土地制度,邮箱:zxh@nau.edu.cn;李金萍(1998—),女,江苏泰州人,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经济学。

数据发现,相较于本地市民,流动人口选择创业的概率高出4.7个百分点^[5]。周敏慧等从企业家资本代际传递的视角论证了家庭成分作为非物质企业家资本的代理变量在农民工创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6]。此外,创业和雇员的工资差异、流入地与原户籍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等也影响进城农民工创业^[7-8]。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关系型国家,创业还涉及各类资源的整合和协调,对于进城农民工这一与原有社会网络有所疏离的特殊群体而言,其创业活动更加依赖于流入地的社会网络资源^[9]。关于社会网络促进进城农民工创业的作用,已有很多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王春超等利用RUMIC数据发现社会关系网络通过提供创业资本和提高企业家能力促进了乡城移民创业^[10];李国正等发现社会关系网络重构能够显著促进流动人口的创业选择并提升其创业绩效^[11]。然而,已有文献对社会网络与创业关系的讨论大多局限于社会网络规模、性质对创业决策的影响^[12],却忽视了社会交往这一动态行为与进城农民工创业之间关系的系统梳理。大量研究表明,多数农民工在流入城市无法突破亲缘、地缘的约束,难以与当地人进行广泛而深刻的交往,其重构的社会网络仍以亲友、同乡等熟人为主,且不断地在这一群体内部拓展^[13]。有学者将这一向内交往倾向称为社会交往内卷化,主要表现为交往对象的同质性,多以情感为基础,交往空间狭窄^[14]。

“内卷化”(involution)一词最早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提出,指社会或文化模式发展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的现象,取而代之的是在内部变得复杂化^[15]。黄宗智用内卷化描述了华北地区家庭农场的一种劳动力集约型农业经营模式^[16];王春光较早地将内卷化与农民工问题联系在一起,他用内卷化来形容“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处于一种游离出农村社会体系和城市社会体系的“非正常和非应然”社会认同状态,且这种社会认同内卷化的根本原因是“城乡分治”制度^[17]。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内卷化现象更加突出,尤其是对进城农民工而言,与本地人沟通的障碍可能意味着信息、资金等资源的缺失,使其社交渠道变得狭窄,进而制约农民工的正常就业和创业等。因此,我们应当关注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创业的影响,但已有文献在这方面的研究较少。

近年来,新一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数字经济日益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学者们一致认同数字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它带来了众多新职业,能够增加创业投入进而提高创新产出能力^[18],且数字经济下的数字金融尤其助长了低物质资本或低社会资本家庭的创业^[19]。究竟数字经济发展能否促进进城农民工的创业,能否缓解社会交往内卷化对农民工创业的不利影响,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中国已经全面步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进城农民工创业的广泛存在,本身就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必然要求,其在解决农民工自身就业问题的同时也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如何缓解进城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创业困境,消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障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各级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随着进城农民工规模的日益庞大,创业正逐渐成为他们的一大选择,而社会交往内卷化可能制约其行为抉择或创业成效。以往文献在使用内卷化概念研究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自主创业等问题时,并没有给出太多的事实证据,本文将“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与数字经济指数相匹配,从微观个体层面实证考察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创业的影响,并评估互联网革命推动的数字经济对上述影响的调节效应。可能的创新在于:一方面,在理论上系统梳理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创业的影响路径,以及数字经济在其中的调节效应,进而提出研究假设;另一方面,利用2017年CMDS数据和数字经济指数,运用Probit方法进行实证检验,为厘清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创业的影响提供新的证据。本文期望拓宽对当前中国进城农民工创业行为的研究视角,弥补以往实证研究的不足,为破解进城农民工创业难题、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提供理论参考。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社会交往内卷化影响进城农民工创业

在社会生活中,个人进行动态的社会交往结成社会网络,带来信息的传递与交换,有助于改善信息

不对称问题。林南在其社会资源理论中指出,社会网络的不同位置代表着权力、财富、声望等资源的多寡,同一阶层的人在资源占有上具有相似性,形成“强关系”,而不同阶层的人之间资源相似性低,信息更少重叠,价值更大,形成“弱关系”^[20]。“弱关系”更有可能获得创业所需信息^[9]。因此,对于离开家乡后面临着与原有社会网络疏离的农民工而言,其在新环境中通过社会交往重新构建社会网络时,应格外注重本地人这一“弱关系”网络,如若呈现内卷化特征,则不利于其扩大社会网络,阻碍社会资本积累,进而面临信息不对称问题,不利于其创业资源和机会的获得^[21]。具体而言,社会交往内卷化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影响进城农民工创业。

一方面,社会交往内卷化阻碍了进城农民工的资源获取,减少了其创业机会。目前大多数进城农民工缺乏流入地城市户籍这一身份,在创业过程中往往享受不到许多与户籍挂靠的社会公共资源,获取市场信息和创业资本的渠道有限^[22]。如果他们在社会交往中存在内卷化倾向,不能与本地人开展深入交流,则将很难融入该城市,并失去创业的机会。而若能建立与本地人的紧密联系,通过开放式交往获得相互间的信任,则将有助于扩大进城农民工的社交范围,使其便捷地获取市场上的各类信息,识别创业机会并降低创业风险,获取早期订单从而实现创业活动^[23]。另外,进城农民工在初始创业阶段往往因身份障碍难以在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信贷支持,而本地人人为之提供的信誉担保将帮助他们尽快获得信贷资金,渡过创业难关,实现创业价值。

另一方面,社会交往内卷化限制了进城农民工企业家才能的提升。企业家才能是创业者的一种基本素质,是创业成败的关键,包括经营管理能力、决策能力、创新能力、应变能力等。进城农民工在创业过程中市场信息欠缺,社会资本不足,甚至面临语言障碍^[24],社会交往内卷化则进一步阻断了他们与本地人的往来,学习不到适用于本地的创业技能及运营企业的相关知识等,进而限制企业家才能的提升,使其不得不退出创业竞争。

此外,根据不同的创业动机,可以把创业分为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两种类型。生存型创业是一种被动的创业行为,指没有其他更好的就业选择、迫于生计而进行的创业;机会型创业是一种主动的创业行为,主要受创业者个人特质影响或受商业机会吸引而产生^[25]。后者更注重对商业机会的识别,通常需要创业者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丰富的工作经验,以及更多的人力资本、社会网络资源和更高的企业家才能,因而社会交往内卷化对机会型创业的抑制作用可能更大。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社会交往内卷化抑制进城农民工创业,且对不同类型创业的影响存在差异。

(二) 数字经济影响进城农民工创业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经济带来的就业岗位数量越来越多,对就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创业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一,数字产业化^①带来新的产品和服务体验,激发了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反过来为创业带来新的机会。第二,数字经济紧扣数据资源、现代信息网络和信息通信技术三大要素,加快了创业信息传播,使得市场交易更加透明开放。一方面,它降低了进城农民工的信息搜集成本,使他们能够充分掌握消费者的个性化偏好和实时的市场信息,识别更多的商业机会进而实现创业^[26];另一方面,开放市场下创业者的大量涌入使得市场竞争加剧,倒逼市场主体加快创新创业的节奏。第三,产业数字化涵盖的数字金融的出现降低了融资门槛,缓解了原来受到金融排斥的农民工群体的信贷约束^[27],提高了其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并激发其创业热情。而且相对于生存型创业,机会型创业更加需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去识别市场上的各种商机,因此数字经济对机会型创业的促进作用可能更加显著。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数字经济促进进城农民工的创业行为,且对不同类型创业的影响存在差异。

①《数字经济分类》(国家统计局[2021]33号)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确定了数字经济的基本范围。

(三) 数字经济对社会交往内卷化影响进城农民工创业的调节效应

首先,数字经济越发达完善,各种社会资源配置越公平,创业门槛越低,人们面临的创业机会也越多。以大数据、云计算等通信技术为支撑的动态、实时、高效的信息共享平台,能够满足进城农民工的各种信息获取需求,如创业决策前商机的把握、创业过程中的信息沟通、创业后的经验交流等,缓解其因社会交往内卷化而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创业。

其次,作为互联网与金融的联合体,数字经济也包含数字金融。金融的创新发展能够缓解进城农民工的信贷资金约束,消除其因社会交往内卷化导致的融资障碍,减少创业成本,增强创业信心。

最后,数字经济的社会互动性在刺激社会资本积累的同时,还将扩大创业的示范效应^[28]。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发迅速而便捷,社会互动频率不断提高,这将有助于推动广大进城农民工更快地融入城市生活和工作,分享本地人创业成功的经验,传播创业技能,激发创业动机,提高创业效能。由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数字经济有助于缓解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创业的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社会交往内卷化阻碍进城农民工的资源获取,减少创业机会,限制企业家才能的提升,从而抑制其创业,且对不同类型创业的影响存在差异,而数字经济有助于缓解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创业的不利影响。据此,图1绘制了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创业的影响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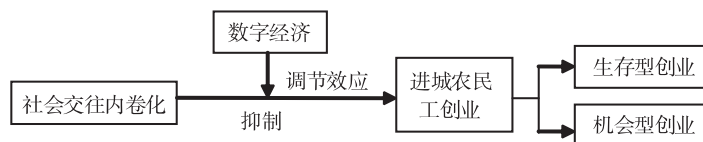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创业的影响路径

四、数据来源、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一) 数据来源

本文将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与数字经济指数相匹配。其中,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覆盖31个省份,涉及流动人口、家庭基本信息和社会交往等多方面,样本量大,覆盖范围广。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对象、数据可得性以及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之间匹配的完整性,本文最终选取CMDS 2017年数据库作为样本来源,并对其作进一步处理。处理过程如下:首先,剔除调查时点户口性质为非农业户口、农业转居民户口、非农业转居民户口、居民户口和其他的样本,仅保留农村户口的样本,剔除样本点在村委会的样本,仅保留在居委会的样本;其次,删去因随迁、上学、投靠亲戚等流动的样本,仅保留因务工、经商而流动的样本;最后,剔除调查期间处于失业状态的样本。基于以上步骤,本文将样本对象限定在进城农民工群体,删去核心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保留有效样本量46169个。

(二) 模型构建

为了探究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创业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在其中的调节效应,本文分别构建以下回归模型。

1. 基本回归模型

$$Prob(Entrepre_{ijc}) = \Phi(\alpha + \beta_1 SII_{ijc} + \beta_2 DE_c + \delta \sum Control_{ijc} + \lambda_c + \varepsilon_{ijc}) \quad (1)$$

式(1)主要检验社会交往内卷化、数字经济对进城农民工不同类型创业的影响。其中, $Entrepre_{ijc}$ 分别表示进城农民工 i 是否进行创业、生存型创业、机会型创业,下标 i, j, c 分别表示农民工个体、家庭和城市; SII_{ijc} 表示社会交往内卷化, β_1 为其系数; DE_c 表示流入地的数字经济水平, β_2 为其系数; $Control_{ijc}$ 是一系列控制变量, δ 为其系数; λ_c 和 ε_{ijc} 分别为城市固定效应和随机误差项。此外,由于本文分析的是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与创业之间的关系,为了避免城市内部农民工之间的相关性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将标准误差聚类到城市层面。

2. 调节效应模型

$$Prob(Entrepre_{ijc}) = \Phi(\alpha + \beta_1 SI_{ijc} + \beta_2 DE_c + \gamma SI_{ijc} \times DE_c + \delta \sum Control_{ijc} + \lambda_c + \varepsilon_{ijc}) \quad (2)$$

式(2)引入社会交往内卷化和数字经济的交互项,用来检验数字经济对社会交往内卷化影响进城农民工创业的调节效应。 $SI_{ijc} \times DE_c$ 为社会交往内卷化和数字经济的交互项,且进行了去中心化处理, γ 为交互项的待估参数,其符号与大小表示数字经济对社会交往内卷化影响进城农民工创业的方向和程度。

(三)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进城农民工创业,设置为二元离散变量。在CMDS 2017年数据库问卷中“受访者的就业状态”这一问题包含“雇主”“有(无)固定雇主的雇员”“自营劳动者”“其他”四类回答,本文将“自营劳动者”和“雇主”合并构造“创业”二值虚拟变量。此外,为了论证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的不同影响,探求差异化的创业策略和政策支持,本文将受商业机会的吸引而主动产生的“机会型创业”对应“雇主”这类创业者身份,将迫于生计而被动进行的“生存型创业”对应“自营劳动者”这类创业者身份。

2. 解释变量

本文解释变量包括社会交往内卷化和数字经济。由前文定义可知,内卷化的社会交往是指进城农民工在流入城市后只与家人、朋友、老乡所进行的熟人交往,交往范围有限,难以扩大到本地人这一“弱关系”网络,进而呈现内卷化特征。参考彭大松的做法^[29],本文根据问卷中“您业余时间都和谁来往最多(不包括顾客)”来测度。选择“很少与人来往”赋值为5,“与户口在老家的人来往”赋值为4,“与户口在本地的同乡来往”赋值为3,“与其他外地人来往”赋值为2,“与其他本地人来往”赋值为1。数值越大越趋向于内卷化交往,反之则呈现逆内卷化的特征。在衡量数字经济方面,目前涉及的文献很少,刘军等从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和数字交易发展三方面构建了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30],赵涛等在互联网发展基础上又加入了数字普惠金融这一指标^[31],更全面地反映了数字经济的内涵。本文参照赵涛等的做法^[31],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两大方面对数字经济进行测度,涉及的指标包括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比、百人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百人中移动电话用户数、人均电信业务总量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其中,互联网发展所需的四个指标通过《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获得,数字普惠金融取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科技集团组成的联合课题组编制的指数^[32]。为了避免出现反向因果问题,本文将数字经济指数滞后一期。上述五个维度数字经济指标的KMO检验值为0.77,满足主成分分析的必要条件,最后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将上述指标标准化,再进行降维处理来构建进城农民工流入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

3. 控制变量

本文根据进城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流入城市的外部环境特征挑选控制变量。首先,进城农民工创业可能受到性别、年龄、健康、最高学历等个人特征变量的影响,由于年龄对创业选择可能是非线性影响,本文将年龄的平方项也纳入控制范围。其次,家庭规模、老家的承包地是否参与土地流转也可能影响进城农民工创业。最后,参考前人研究^[33],本文选取城市创业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衡量外部环境特征的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EPS数据平台和Wind数据库。

表1报告了各变量的含义及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调查当年所有受访的进城农民工样本中有41.9%选择创业,且其中大多数是生存型创业,机会型创业仅占12.6%。不难理解,与生存型创业相比,机会型创业对进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要求相对较高,且农民工对创业风险的承受能力较弱,从而限制了其进入。核心自变量社会交往内卷化的均值为3.141,说明进城农民工存在向内交往倾向。除此之外,受访者平均年龄约40岁,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出生人口,对互联网相关知识和技能有一定的了解,且积累了一定的社会阅历和工作经验,是研究创业较为合理的样本;样本最高学历的均值为

初中,说明进城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不高。

表1 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定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进城农民工创业	雇主和自营劳动者=1,其他=0	0.419	0.493	0	1	
	生存型创业	自营劳动者=1,其他=0	0.366	0.482	0	1	
	机会型创业	雇主=1,其他=0	0.053	0.224	0	1	
解释变量	社会交往内卷化	业余时间和谁来往最多,依次赋值5-1	3.141	1.563	1	5	
	数字经济	根据指标测度所得	0.935	1.405	-1.147	4.833	
	性别	男性=1,女性=0	0.635	0.481	0	1	
	年龄	调查年份减去出生年份	39.990	7.791	15	79	
	年龄平方	年龄(岁)的平方/100	16.314	6.457	2.25	59.29	
	民族	汉族=1,其他民族=0	0.925	0.263	0	1	
	最高学历	已完成的最高学历:文盲=0,小学=1,初中=2,高中或中专=3,大专=4,本科及以上=5	2.194	0.975	0	5	
	控制变量	健康	户主健康状况自评:生活不能自理=0,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1,基本健康=2,健康=3	2.815	0.429	0	3
		党员	党员=1,非党员=0	0.035	0.184	0	1
		婚姻状况	在婚=1,其他=0	0.852	0.355	0	1
本地家庭规模		受访者在流入地的家庭成员数	3.392	1.079	1	10	
土地流转		老家土地转出,是=1,否=0	0.138	0.345	0	1	
创业水平		2016年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占城市年末总人口比重	0.264	0.214	0.017	0.963	
经济发展水平		2016年流入城市人均GDP的对数(元)	11.171	0.505	9.384	12.281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 社会交往内卷化、数字经济对进城农民工创业的影响

表2显示了社会交往内卷化和数字经济对进城农民工创业影响的Probit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为单独考虑社会交往内卷化影响的情况,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创业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社会交往越趋于内卷化,越不利于进城农民工创业。模型2为单独考虑数字经济影响的情况,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给进城农民工创业带来了不利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尽管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各类信息、资源、技能的传播,且进城农民工普遍能够享受到互联网带来的好处,但由于其受教育程度不高,自身的人力资本及物质资本有限,因而并不能掌握到数字经济的真正内核,且数字经济创造的新岗位使得农民工在就业市场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从而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创业意愿。模型3为同时考虑社会交往内卷化和数字经济影响的情况,结果显示社会交往内卷化的负向影响依旧显著,数字经济的不利影响也未改变。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社会交往内卷化	-0.016*** (0.004)	—	-0.009*** (0.004)
数字经济	—	-0.039* (0.013)	-0.037* (0.131)
性别	0.028** (0.013)	0.029** (0.013)	0.029** (0.013)
年龄	0.004*** (0.001)	0.006*** (0.001)	0.006*** (0.001)
年龄平方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民族	0.258*** (0.024)	0.246*** (0.024)	0.246*** (0.024)
最高学历	-0.089*** (0.007)	-0.134*** (0.007)	-0.137*** (0.007)
健康	0.015 (0.014)	0.020 (0.014)	0.019 (0.015)
党员	-0.147*** (0.035)	-0.182*** (0.035)	-0.183*** (0.035)
婚姻状况	0.642*** (0.023)	0.574*** (0.024)	0.573*** (0.024)
家庭规模	0.114*** (0.007)	0.070*** (0.007)	0.071*** (0.007)
土地流转	0.073*** (0.018)	0.047*** (0.018)	0.047** (0.018)
创业水平	0.128* (0.038)	0.089* (0.041)	0.087* (0.041)
经济发展水平	0.186** (0.015)	0.158** (0.018)	0.158** (0.018)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项	-2.456*** (0.173)	-2.496*** (0.208)	-2.522*** (0.208)
R ²	0.074	0.096	0.096
N	46169	46169	46169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同。

(二) 社会交往内卷化、数字经济对进城农民工不同类型创业的影响

本文进一步研究社会交往内卷化和数字经济对生存型创业与机会型创业的影响,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4是生存型创业的估计结果,模型6是机会型创业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社会交往内卷化对于两种创业的影响均显著为负,其既抑制了农民工开展生存型创业活动,也不利于他们成为机会型的创业者。具体而言,社会交往内卷化对农民工生存型创业的抑制效应为0.8%,而对机会型创业的抑制效应为4.3%,可见对机会型创业的抑制效应更强,支持了假设1。模型5和模型7加入了数字经济,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响农民工的生存型创业,而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为正向,假设2部分得证。这进一步说明数字经济及相关产业衍生出的新岗位给予了熟悉互联网技能的农民工更多的就业选择,导致其创业的机会成本更高,对创业收益的期望更大,从而不愿从事收益不高、辛苦又受歧视的生存型创业^[34-35]。而对于机会型创业者来说,即使数字经济带来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但只要创业条件具备,且有更高的成长预期,他们依然会选择企业家型的自营^[6],即机会型创业。

在考虑创业不同类型的回归模型中,一些控制变量也是值得关注的。在个体特征方面,男性具有更高的机会型创业概率,可能是由于男性的风险容忍度更高^[36],更愿意从事机会型创业这类冒险行动;年龄的增长将显著促进生存型创业并抑制机会型创业;汉族农民工从事生存型创业的概率显著高于少数民族农民工;最高学历对生存型创业呈显著负向影响,证明了生存型创业是低学历进城农民工的无奈选择;无论是生存型创业还是机会型创业,在婚人士均具有更高的创业概率,而健康均无显著影响。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规模显著提高了生存型创业的概率;参与土地流转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机会型创业,表明鼓励进城农民工自愿流转出农村的承包土地不仅有助于他们专心在城市创业,而且土地流转租金收入正好弥补了创业资金的短缺,激发其创业行为。在外部环境方面,农民工流入城市的创业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均有助于激励其进行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

(三) 数字经济对社会交往内卷化影响进城农民工创业的调节效应

本文接下来引入社会交往内卷化与数字经济的交互项,考察数字经济是否在社会交往内卷化影响进城农民工创业的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结果如表4所示,对于进城农民工的创业,社会交往内卷化的系数为负且统计上显著,社会交往内卷化与数字经济交互项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与不加入交互项的基准模型相比,调节效应模型的R²增加了0.0002,模型的解释程度得到提升,说明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交往内卷

表3 不同创业类型的回归结果

变量	生存型创业		机会型创业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社会交往内卷化	-0.008*** (0.004)	-0.003*** (0.004)	-0.043*** (0.007)	-0.043*** (0.007)
数字经济	—	-0.035* (0.013)	—	0.002* (0.023)
性别	-0.015 (0.013)	-0.015 (0.013)	0.159*** (0.022)	0.159*** (0.022)
年龄	0.007*** (0.001)	0.007*** (0.001)	-0.005*** (0.002)	-0.005*** (0.002)
年龄平方	0.002* (0.001)	0.002* (0.001)	-0.001 (0.002)	-0.001 (0.002)
民族	0.247*** (0.024)	0.249*** (0.024)	0.035 (0.041)	0.035 (0.041)
最高学历	-0.129*** (0.007)	-0.128*** (0.007)	-0.006 (0.012)	-0.001 (0.012)
健康	0.017 (0.015)	0.018 (0.015)	0.009 (0.025)	0.009 (0.025)
党员	-0.194*** (0.036)	-0.193*** (0.036)	0.005 (0.053)	0.004 (0.053)
婚姻状况	0.555*** (0.024)	0.554*** (0.024)	0.360*** (0.043)	0.359*** (0.044)
家庭规模	0.085*** (0.007)	0.085*** (0.007)	0.001 (0.011)	0.001 (0.012)
土地流转	0.041 (0.018)	0.039 (0.018)	0.041* (0.029)	0.041* (0.029)
创业水平	0.045** (0.040)	0.045** (0.038)	0.019* (0.062)	0.021* (0.068)
经济发展水平	0.114** (0.015)	0.087** (0.015)	0.093** (0.025)	0.092** (0.031)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2.089*** (0.177)	-1.791*** (0.210)	-1.116*** (0.292)	-1.127*** (0.346)
R ²	0.075	0.075	0.105	0.105
N	46169	46169	46169	46169

表4 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创业	生存型创业	机会型创业
社会交往内卷化	-0.017*** (0.005)	-0.003 (0.005)	-0.048*** (0.008)
数字经济	-0.088* (0.023)	-0.078 (0.024)	0.036* (0.037)
交互项	0.015** (0.006)	0.013 (0.006)	0.011* (0.010)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项	-2.519*** (0.209)	-1.787*** (0.210)	-1.133*** (0.346)
R ²	0.096	0.075	0.105
N	46169	46169	46169

化对进城农民工创业的负向影响将逐步得到抑制,即数字经济有助于缓解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创业的不利影响,假设3得证。

从创业的不同类型来看,数字经济的调节效应存在差异。在生存型创业模型中,社会交往内卷化和数字经济的交互项为正但不显著,说明数字经济并没有缓解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生存型创业的不利影响;而在机会型创业模型中,交互项为正且统计上显著,说明数字经济在资源获取、技能培训等方面抑制了社会交往内卷化对机会型创业的负向影响。

(四) 内生性检验

由于反向因果内生性问题的存在,上述实证结果可能会导致偏误,即在创业过程中进城农民工可能为了获取创业机会和创业资源,有目的地向外拓宽社会网络,与本地人进行密切的社会交往,而滞后一期的数字经济指数不会受到农民工创业的影响。为了克服上述反向因果问题对实证结果可能造成的偏误,本文借鉴王春超等的做法^[10],构造“同一城市相同职业的进城农民工社会交往内卷化的平均值”作为社会交往内卷化的工具变量,该工具变量的选择满足外生性和与解释变量高度相关两个条件。由于本文的内生解释变量为离散型变量,因此采用ERM扩展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5中创业、生存型创业以及机会型创业的误差相关系数均显著,表明社会交往内卷化存在内生性问题。内生变量回归利用社会交往内卷化和交互项的工具变量对二者进行Probit回归,回归系数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由主回归模型可知,与之前的基础回归相比,虽然社会交往内卷化、交互项对农民工创业、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的回归系数发生了一定变化,但符号和显著性均未改变,说明本文结论并没有受到上述反向关系的干扰。

(五)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选择“与其他本地人来往最多”选项的农民工样本赋值为0,代表更大范围和更高密度的社会交往,其他样本均赋值为1,表示更小范围和更低密度的社会交往。表6显示回归结果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证实了本文核心结论的稳健性。

表5 内生性检验:扩展回归模型(ERM模型)

变量	创业	生存型创业	机会型创业
主回归			
社会交往内卷化	-0.172*** (0.016)	-0.111 (0.016)	-0.247*** (0.026)
交互项	0.221** (0.023)	0.244 (0.024)	0.010* (0.047)
内生变量回归			
社会交往内卷化	0.928*** (0.018)	0.928*** (0.018)	0.928*** (0.018)
交互项	0.992*** (0.003)	0.992*** (0.003)	0.992*** (0.003)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误差相关性	0.437*** (0.021)	0.374*** (0.023)	0.321*** (0.043)
N	46169	46169	46169

表6 稳健性检验

变量	创业	生存型创业	机会型创业
社会交往内卷化	-0.167*** (0.015)	-0.121 (0.015)	-0.168*** (0.024)
数字经济	-0.025* (0.013)	-0.024 (0.013)	0.003* (0.023)
交互项	0.007* (0.021)	0.025 (0.021)	0.037* (0.033)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项	-2.576*** (0.209)	-1.876*** (0.211)	-2.213*** (0.349)
R ²	0.098	0.076	0.106
N	46169	46169	46169

六、结论性评述

本文以进城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首先在理论上系统梳理了社会交往内卷化、数字经济对进城农民工创业的影响,然后将CMDS数据库与数字经济指数相匹配,采用Probit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并进一步验证了数字经济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社会交往内卷化显著抑制了进城农民工创业,且对机会型创业的抑制效应更大;数字经济负向影响进城农民工的生存型创业,而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为正向;数字经济有助于缓解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机会型创业的不利影响。因此,在当前进城农民工仍然存在社会交往内卷化现象的背景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及其相关产业,将有利于缓解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创业的不利影响,加速他们与城市间的融合,通过不断地创业提升其社会地位,实现城乡共同富裕。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如何推动进城农民工进行更高质量的创业提供了政策启示。第一,加深进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由于进城农民工的身份劣势使其在流入地建立新的社会网络时面临较大障碍,内心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在创业资源的获取和技能的习得等方面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不公正现象,因此,各级政府应当积极鼓励进城农民工与本地人搭建社会关系网络,创造有利于农民工进行社会交往和社区参与的环境,增进两大群体之间的交流频率和深度。第二,采取差异化的创业扶持策略。一方面,目前我国进城农民工的创业活动主要集中在低层次、因被城市就业市场挤兑而不得不选择的生存型创业,创业质量不高,这说明进城农民工由于文化水平低等因素在劳动力市场面临就业歧视,且农村职业技能培训体系还不够完善,导致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无法在就业市场获得工作。与生存型创业相比,机会型创业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拥有更长的生存时间和更强的创新能力,从而对经济发展有着更为积极的影响,应该受到更大的鼓励^[37]。各级政府应当制定具体的政策以保障城乡劳动者享有平等公正的就业机会,同时要健全农民工职业培训体系,提高劳动技能与就业市场的匹配度,以消除农民工在就业市场面临的各种歧视,降低其被迫进行生存型创业的概率。另一方面,针对机会型创业人群,构建本地人网络固然可以为创业打开便利之门,但更深层次的还是要提高农民工自身的素质和人力资本水平,增强专业管理能力和敏锐的商业嗅觉,使其能够借现代技术迅猛发展之势更主动地开展高层次的创业。因此,对这类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民工要给予各种创业指导和服务,积极宣讲创业政策,激发他们的创业热情。第三,加快数字经济及相关产业发展。把握未来科技发展的方向,加快互联网知识、技术及智慧产业知识的培训与普及,拓宽数字经济的覆盖范围,让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工能够快速加入数字型现代产业发展的队伍,捕捉创业商机,共同分享数字经济的红利。此外,应当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一新兴传播媒介,广泛宣传创业成功的事例和经验,在农民工群体中营造浓厚的创业氛围,提高其机会识别能力并消除对创业失败的恐慌,实现创业层次的不断跃升。

本文在以下两方面仍具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一方面,本文仅从进城农民工整体出发,探讨社会交往内卷化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未来可分别针对第一代进城农民工、新生代进城农民工等不同群体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另一方面,关于数字经济的测度,随着时代发展,需要我们继续探讨科学测度数字经济的指标体系、评价方法等,进一步提高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参考文献:

- [1] 杨如意. 农民工创业困境与精准扶贫战略创新研究[J]. 农业经济, 2021(8): 71-73.
- [2] 朱红根, 解春艳. 农民工返乡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2(4): 36-46.
- [3] 谢勇, 周润希. 农民工的返乡行为及其就业分化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17(2): 92-101.
- [4] 李敏, 阎晓博, 黄晓慧. 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返乡行为的影响——基于代际差异视角的分析[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1): 90-98.
- [5] 张双志, 张龙鹏. 中国流动人口的创业效应研究[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7(7): 138-148.
- [6] 周敏慧, Jean L A, 陶然. 企业家精神代际传递与农村迁移人口的城市创业[J]. 经济研究, 2017(11): 74-87.
- [7] 刘云平, 王翠娥. 外来务工人员自我雇佣决定机制的性别差异[J]. 人口与经济, 2013(4): 96-102.
- [8] 叶文平, 李新春, 朱沆. 地区差距、社会嵌入与异地创业——“过江龙”企业家现象研究[J]. 管理世界, 2018(1): 139-156.
- [9] 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78(6): 1360-1380.
- [10] 王春超, 冯大威. 中国乡—城移民创业行为的决定机制——基于社会关系网的分析视角[J]. 经济学(季刊), 2018(1): 355-382.
- [11] 李国正, 韩文硕, 艾小青, 等. 社会关系网络重构与流动人口创业活动——作用机理与政策含义[J]. 人口与经济, 2021(3): 1-17.
- [12] Zhang J F, Zhao Z. Social-family network and self-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temporary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J]. IZA Journal of Labor & Development, 2015, 4(1): 1-21.
- [13] 肖云, 邓睿.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困境分析[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1): 36-45.
- [14] 叶鹏飞. 探索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之路——基于社会交往“内卷化”的分析[J]. 城市发展研究, 2012(1): 81-85.
- [15] Clifford G.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63:80-82.
- [16] 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7] 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和融合关系[J]. 社会学研究,2001(3):63-76.
- [18] 夏杰长,姚战琪,徐紫嫣. 数字经济对中国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J]. 社会科学战线,2021(6):67-78.
- [19] 张勋,万广华,张佳佳,等.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J]. 经济研究,2019(8):71-86.
- [20] 林南. 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和行动的理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21] Hu M Z, Su Y X, Zhang H Y.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The family as emotional support, soci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J].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2019, 57(12):1-20.
- [22] 彭大松. 资源. 农村流动人口社会交往内卷化[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130-140.
- [23] 曹永福,杨梦婕,宋月萍. 农民工自我雇佣与收入:基于倾向得分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13(10):30-41.
- [24] 杨晔,朱晨,谈毅. 方言能力、语言环境与城市移民创业行为[J]. 社会,2019(1):211-236.
- [25] Degroof J J. Academic spin-off processes and types of ventures in regions outside high tech clusters: The case of Belgium[C]. Babson Conference o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Babson College, Best Paper Proceedings, 2004.
- [26] 张蕴萍,董超,栾菁. 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99-115.
- [27] Can X, Fu S Z. Influence of digital finance on efficacy of entrepreneurship by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J]. Discrete Dynamics in Nature and Society, 2021(4):1-11.
- [28] 周广肃,樊纲. 互联网使用与家庭创业选择——来自CFPS数据的验证[J]. 经济评论,2018(5):134-147.
- [29] 彭大松. 内卷化与逆内卷化: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代际流向差异[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5):112-123.
- [30] 刘军,杨渊望,张三峰. 中国数字经济测度与驱动因素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2020(6):81-96.
- [31] 赵涛,张智,梁上坤. 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2020(10):65-76.
- [32] 郭峰,王靖一,王芳,等. 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J]. 经济学(季刊),2020(4):1401-1418.
- [33] 李政,杨思莹. 国家高新区能否提升城市创新水平? [J]. 南方经济,2019(12):49-67.
- [34] Knight J. Migrant employment in the ethnic economy: Why do some migrants become ethnic entrepreneurs and others co-ethnic worker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2015, 16(3):575-592.
- [35] 李经,陈勇吏. 最低工资制度对创业的影响——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研究[J]. 产业经济评论,2018(2):105-124.
- [36] 丁栋虹,张翔. 风险倾向对个体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J]. 管理学报,2016(2):229-238.
- [37] 胡浩,王海燕. 社会互动与农村家庭创业决策、创业动机[J]. 软科学,2019(3):25-29.

[责任编辑:高 婷]

Social Interaction Involution, Digital Economy and Migrant Workers Starting Businesses in Cities

ZHANG Xiaohan, LI Jinping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 Encouraging migrant workers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and realize common prosperity in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2017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CMDS) and the calculated digital economy index,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social interaction involution on migrant workers starting businesses in cities and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It is found that social interaction involution significantly inhibits migrant workers starting their own business in cities, and has a greater inhibitory effect on opportunistic business; Digital economy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survival business of migrant workers, while it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opportunistic business; Digital economy helps to alleviate the adverse impact of social interaction involution on opportunity business of migrant workers in cities.

Key Words: social interaction involution; migrant workers; digital economy; survival business; opportunistic business; migrant workers starting business; agricultural economy